

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杨新华, 罗 帅

(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 要:新型城镇共同体动力机制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十分关键。基于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经济与环境的冲突、文化传承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发现:自然生态系统决定城镇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及其路径,城镇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将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使两者之间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而政治共同体将通过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这种四位一体的动力机制耦合度将决定新型城镇共同体发展质量,其中拥有主观能动性的城镇文化共同体是4个子系统中的枢纽性动力,在基于现有价值观念协调子系统矛盾和张力的同时,也会接受四者之间的正负反馈,进而扬弃城镇传统文化,使新型城镇共同体始终拥有良性耦合动力机制。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城镇共同体;系统耦合;城镇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291.1;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02-0181-10

Dynamic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community

YANG Xinhua, LUO Shuai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 community that explore its dynamic mechanism. Aiming at the conflicts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lack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try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new urban community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y using system dynamics analysis method. Analyzing its dynamic mechanism,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atural ecosystem determines the potential and path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urban culture will make the benign coupling into real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will ensure that this possibility becomes a reality through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is four-in-one dynamic mechanism will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new urban community, bu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urban cultural community is a critical pivotal power in the four subsystem, it will coordinate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subsystems based on existing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ccep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from the four subsystems, and then sublim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owns, so new urban community always have a benign coupling dynamic mechanism.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rban community; coupling mechanism; urban cultural community

收稿日期:2022-11-02 修回日期:2023-02-09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援疆专项“喀什大学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新型城镇化研究团队为例”(K18402)。

作者简介:杨新华(1969—),男,湖北监利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演化经济分析。通信作者:罗帅。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和强大动力,是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和《“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特别强调“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着力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突出短板问题和风险,致力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但新型城镇化实践还存在着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的良性耦合机制尚未形成、城镇文化的扬弃与传承不断弱化、交通拥堵、水患频发及城镇新区几乎千城一面等问题。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对城镇化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迫在眉睫^[1-2]。可以认为,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城镇化质量和亟待增强的城市治理能力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视角,对诸如交通拥堵和城镇水患的治理多基于工程技术的运用,而较少从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和自然生态角度开展系统性研究,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足也制约了系统思考和综合施策的可能性。有学者在经济社会系统范畴内持续关注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作用机理,也有学者在探究城镇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3],但还是缺少使用跨学科的系统研究方法,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探究城镇子系统动力机制耦合机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城镇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自适应有机体。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各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叠加耦合的结果,很难在单一学科领域找到问题的完整答案。

为弥补现有跨学科系统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城镇共同体界定为由城镇自然生态系统、城镇经济共同体、城镇文化共同体和城镇政治共同体构成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充分借鉴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生态、经济、文化和政治 4 个学科视角开展跨学科系统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探究城镇

自然生态系统、城镇经济共同体、城镇文化共同体和城镇政治共同体的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研究这四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这种创新性的跨学科系统研究成果,有助于构建城镇共同体 4 个子系统之间的良性耦合机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通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文献梳理

国内有关城镇化质量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基于指标测评的应用性研究、城镇化质量内涵和研究范畴及其维度的探究,涉及到城镇子系统耦合机理方面的研究文献不多。国外学者近 5 年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城市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城市经济成果共享和绿色城镇化。国内外高质量研究成果是本文探讨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

就城镇化质量测评而言,肖祎平等^[4]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市化推进效率、城乡一体化程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4 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没有就二级指标选择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而只有一个解释性说明。赵玉等^[5]从经济发展、科技支撑、生态环保和协调共享 4 个方面测度了高质量城镇化,但没有考虑城镇公共服务和城镇治理这两个维度,将科技支撑与其它三个指标并列作为二级指标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徐维祥等^[6]在考虑居民福利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后,重构了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认为环境规制对城市化质量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对现有指标体系的完善有贡献。张慧等^[7]将城市韧性视为高质量城市化的一个维度,以测评城市应对灾害风险能力,是对现有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至此,高质量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呈现出基本的共识,但仍没有涉及城镇文化这个因素。姚科艳等^[8]构建了城市化质量与文化产业发展互动效应的 VAR 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9]从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各级指标的主观赋权以及缺少城

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维度,限制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苏红键^[10]创造性地从协调融合的视角强调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城市之间、人地之间的结构关系,但仅仅只是由4大类8个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王冬年等^[11]基于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乡统筹、公共服务质量等4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构建的评价体系,因城镇文化和城镇治理维度的缺失而失去了部分解释能力。关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化质量的关系,戴为民等^[12]认为,城镇化质量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居民生活质量,李琪^[13]从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胡晶晶等^[14]进一步论证了经济、空间及生活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水平的“质”。新西兰统计局的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也包含健康、安全及住房等方面的生活质量指标,上海城调队课题组进一步将生活质量细分为收入、消费、生态环境及社会保障等9个方面^[15]。事实上,居民生活质量才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和高质量发展的唯一指向,必然也是构成城镇化质量测评的重要指标。

国外学者有关城市化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共享以及城市的绿色化方面。Sarkar等^[16]比较关注城市知识经济与高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功能性大都市地区特定高收入的知识经济相关行业中,工人数量和总收入存在基于城市规模递增的规模回报,而城市经济规模收益不变,但论文没有进一步分析知识经济的溢出效应和财富的第二次分配对最终分配的修正。Sarkar等^[17]实证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越富有,且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越大,较高收入群体的增长更快,收入差距也会越大,但对这种正反馈机理的分析还比较简单。Shutters^[18]的研究表明,美国城市总工资随城市规模呈超线性非均衡增长,最高工资收入者的总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所有其他群体,Manduca^[19]基于法国的数据、Roca等^[20]基于西班牙的数据研究验证了这个判断,至于超线性非均衡增长的原因则没有太多的解释。Shutters^[21]研究美国大都市和小城市地区的年工资总和与劳动力的幂律比例系

数后也发现,全球化时代小都市区的溢价有所下降,而大都市地区的溢价普遍上升。Shutters等^[22]研究6个工业化国家城市职业网络密度与网络规模的关系后发现,网络密度或经济相互依存度都随着不同职业的数量呈超线性增加,但对这种因专业化分工演进与报酬递增而引致的现象没有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可以认为,这些实证性研究结论无疑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实践相互印证,但几乎没有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仅限于微观层次的分析也无法提出可行的建议。在城市的绿色化研究方面,Thapa等^[23]以全球246个案例为基础研究了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的生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与农业经济可行性和就业相关的社会成果大部分是积极的,而与文化和公平相关的社会成果主要是消极的。Muñoz等^[24]基于奥地利8000多个家庭的碳足迹数据研究了城市化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城市居民的碳足迹最低,其次是农村居民,然后是半城市居民。Ceola等^[25]还发现了地表水流失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Jalalzadeh等^[26]则发现了热脆弱性指数(HVI)与城市化水平的正相关,Whanhee等^[27]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些城市绿色化的代表性实证研究结论是可信的,但将城市环境恶化的原因归结于单一或少数几个方面是有缺陷的,任何城市现象都是城市经济、自然生态及城市文化等各子系统之间非线性作用的结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尚未开启。

综上所述,城镇化质量测评指标体系的研究虽然已形成共识,但还有不足,尤其需要开展跨学科视角的系统性研究,完善测评指标体系的维度。研究范畴及其维度的研究还略有分歧,大致认为城镇化质量应涵盖城镇经济及城乡一体化、居民生活质量、城镇空间与可持续发展、城镇人口与环境等维度。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共识性的研究维度也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梳理各维度的作用层次及其可能的范畴交叉,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构建更客观、更能准确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才有可能。国外学者的实证研

究成果需要在肯定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这些分析还只是客观现象的定量描述,至于导致工资水平差异扩大和分配不公平以及城市化对环境的消极影响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几乎没有进一步的探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可以对城镇化质量的某些侧面属性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但目前的研究仅限于人口—经济—环境系统这个范畴,还很少涉及城镇治理和城镇文化这两个维度。基于此,本文将城镇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城镇治理和城镇文化视为“四位一体”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阐述四者之间的耦合机理。

二、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一) 城镇共同体内涵

提炼共同体内涵可以发现,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载体,无论是分工不甚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是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共同体都是一种客观、必然的联结方式。学者对城镇是否是共同体尚有歧见。工业化早期的城镇是共同体,大城市则不是^[28]。城市是一种共同体,却将绝大部分西方中古城市和 18 世纪城市排除在外^[29]。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共同体存在的价值基础^[30],由各种共同体迭加而突现的城镇有机体也是如此。

本文认为,城镇共同体是指在城镇经济生活的专门化和网络化进程中,行为自主体为了获取满意的适应状态而基于相同或相近的目标及利益追求、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与理性算计,而自主联结成为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城镇共同体在致力于物质财富创造而构建经济共同体的同时,还基于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情感纽带和风俗习惯,构建个性化的、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共同体,赋存其中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理解城镇共同体凸现及其存续、演变的锁钥。源于城镇公共事务治理需要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职业共同体以及价值共同体都是城镇共同体的多个侧面。

(二) 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内涵

在传统型城镇共同体生长发育的各阶段,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城镇系统,都主要致力于追求

满意的经济适应能力,在更多关注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几乎忽视了城镇自然生态和城镇文化之于城镇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价值,城镇公共事务的治理往往陷于被动应付的窘境。新型城镇化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但尚未将城镇经济、城镇自然生态、城镇文化与城镇治理视为一个必然的有机整体,有关四者之间良性耦合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还没有引起关注。在以新发展理念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势必需要扬弃传统型城镇共同体的内涵,将城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最新阶段,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是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创新以推进城镇经济的分工与专业化演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协调人与自然的张力以实现和谐共生,构建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城镇治理与城镇自然生态四个子系统之间的良性耦合机制,共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有四个侧面。①以人民为中心,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民生福祉的增进,以物质财富积累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度和尊严感。②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原则,着眼于“碳达峰”和“碳中和”远期目标,探索运用自然生态演变规律,确保国家自然生态安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③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着眼于城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培育、自然生态环境健康稳定 and 良好生态服务的供给,而创新驱动和核心技术突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3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城镇文化的扬弃与传承,使之成为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指引,构建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永续动力。④在协调城镇经济发展、自然生态安全、城镇文化发展与城镇良性治理四个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同时,着力探索四者之间的矛盾调适,科学构建良性耦合机制,实现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

三、城镇共同体的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一) 城镇共同体的结构

城镇共同体的微观结构必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总可以发现其变动不居的宏观构造。首先,城镇共同体只能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底启动其历时演变;其次,自然资源禀赋与专业知识的共同孵化,将催生出分工水平与专业化精细程度不断提高的分工网络;再次,分工网络的层级结构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而与之共生的公共事务势必催生政治共同体的突现,以实现城镇的有效治理;最后,能动性主体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反馈结果凝练为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其内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将调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以获取满意的适应状态。据此可以认为,城镇共同体主要由城镇自然生态、城镇经济、城镇文化及城镇政治4个子系统构成。

1. 城镇自然生态系统

自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既是生活的场所,也决定着经济活动的潜在可能和发展路径。新型城镇化适应自然生态环境压力,是新时代城镇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32]。生态系统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系统,与城镇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休戚与共。附存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输入城镇经济系统,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部分转换为物质财富,另外一部分以废弃物形态重新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城镇共同体将因技术经济进步和制度创新而获得发展,而生产活动排放的废弃物种类和总量也将快速累积。同时在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所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最终也将进入自然生态系统。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在没有完全掌握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之前,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越强,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可能性就越大,也会逐步弱化其自我净化能力。当废弃物的种类和总量超出自然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时,城镇生产生活环境将急剧恶化。正如科特金^[33]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方式必然消减经济发展潜力,降低居民生活质量。事实上,城镇作为深深嵌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有机体,必须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为准

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调和自然生态系统与城镇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张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人民群众孜孜以求的美好生活提供一种现实可能。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持续提高稀缺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不断降低生产生活中最终废弃物的排放水平,同时通过生态系统功能的修复与优化,最终实现“碳达峰”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碳中和”。辜胜阻等^[34]就指出,绿色城镇化的战略重点包括绿色产业体系构建、城镇基本“硬件”绿色升级、城镇空间规划布局优化和城镇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等方面。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构建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良性耦合机制的指引,还是城镇文化共同体建设的硬核和基石,也是城镇政治共同体建设的灵魂。

2. 城镇经济共同体

从城镇起源及其演变路径来看,政治与军事是商品经济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城镇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后,城镇才具有了经济共同体的属性。正是欧洲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个体之间从人身依附的政治纽带向自由平等的经济纽带转换时,城市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开始向经济共同体转换^[35]。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良性耦合可以通过城镇工业的专业化演进,创造出新的职业种类和就业岗位^[36]。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有效的前提下,专业化演进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为高技能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回报和流动投资,为众多低技能农民工获取城市工资溢价创造了条件^[37]。

需要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让创新成为第一动力,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良性耦合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协调经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的良性耦合机制,实现城镇经济的绿色化和低碳化。至于个体间非人格的、冷漠的理性算计^[38],则可以通过城镇政治共同体的良性治理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而获得消解。

3. 城镇政治共同体

经济活动是城镇凸现及存续与发展的物质条

件,而政治活动也是城镇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按照亚里士多德“城邦即政治社团”的观点^[39],政治共同体不仅能为城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秩序和劳动成果的合法持有提供保障,还能够为财富与资源的分配提供基本的政治原则。城镇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公共性^[40],使得城镇政治共同体建设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必然需求。事实上,城镇政治共同体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化和提高,不仅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有效的公共秩序,还为城市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必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引领。具体而言,城镇政治共同体之于经济活动的价值有四个方面。①维护正常的城镇经济活动秩序。②统一的政治架构或意识形态,既是一种凝聚力,也为劳动成果的安全持有提供强力保障。③为城镇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④为城镇存续与发展提供诸如“正义”“友爱”及“幸福生活”等基本政治原则。“正义”原则既体现在社会共同财富的分配正义,也表现为非正当获利的调节正义,还体现在个体间经济交换的互惠正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互惠正义在强调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同时,还意味着市场交换注定是一种共同体行为,从而使得个体在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同时,也为共同体其他成员提供了现实可能。在相互友爱的城邦中,实践正义更有保证。友爱与正义共同构成良善城邦的坚实基础,为个体幸福生活的实现提供动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以最高善业(即幸福)为目的的城邦,不仅是通过公共权力机关的活动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创造和保障公民过上既富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又能充分满足物质需要的幸福生活。

新时代政治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准则,协调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推动两者之间的良性耦合,指导城镇文化共同体建设。

4. 城镇文化共同体

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集聚的场所,也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一种心理状态^[41]。可以将其结

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3 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城镇有形的物质载体,如建筑、道路、植被等;第二层次是处理人际交往的各种行为规范,如家庭婚姻制度、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等;第三层次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隐含在各异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中的价值观念,是制约和规范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城市文化的硬核。城镇文化的内核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价值尺度和行为动机^[42]。陈波等^[43]还从地域空间上将中国城市文化场景区分为魅力型场景、本土型场景、理性型场景和表达型场景。“一方水土”孕育的城镇文化是基于共有的文化共同体价值影响成员选择的重要力量。个体正是基于某一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和心理定式融入到城镇的存续与发展的历时路径,才能在意识上确立个体身份和社会角色,还能通过比较赋予个体独特的文化身份符号与位置标识。当这种析出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情感得到城镇个体广泛认可和接受,并内化为自身行为规范时,城镇文化共同体便已突现为一个不依个体主观意志的客观实在。这种以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和人文情感为依归的文化共同体是城镇共同体不竭的生命之源,不断析出和传承的城市文化通过“文而化之”,使浸润其中的居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眷念,一份只属于这个城市的独特情感,从而将所有居民链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傅才武等^[44]强调城市的发展还使得城市公共精神成为居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文化共同体建设,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其内含的价值观念是城镇政治共同体运行的准则,也是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构建良性耦合机制的指引。需要强调的是,城镇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城镇文化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45]。

(二) 城镇共同体的动力机制

有关城镇系统动力机制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大致归纳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地理环境等方面^[46]。而从系统动力学的跨学科角度看,城镇共同体由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

自然生态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是一个持续生长演变的复杂自适应系统,正是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与耦合构成了自适应生长的动力机制(见图1)。需要指出的是,从城镇共同体的突现及其演变的历时路径来看,子系统的涌现及其功能并不相同。下文将据此阐释四者之间的耦合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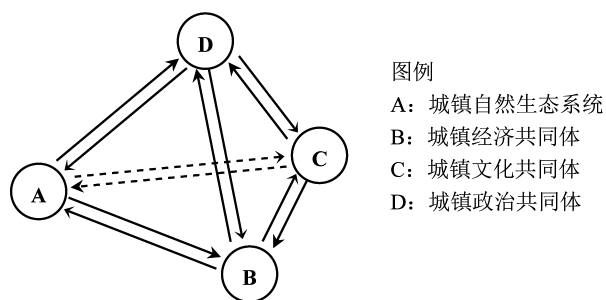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共同体动力机制耦合图解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结构与功能复杂多样的自适应生命共同体,既先于人类社会又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是气候与地质活动历时演变的结果。这种先于城镇的突现且自在于城镇共同体之外而演变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接纳人类社会的同时就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临界点和极限值。这就意味着城镇经济活动在既定技术条件下,获取自然资源的数量必须低于这个临界点,且在加工、分配与消费过程中所产生废弃物的数量和种类也必须在城镇自然生态系统净化能力范围之内,才能够为城镇经济活动继而为城镇生长提供稳定健康的生态服务。但也需要指出,主观能动性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持续提高对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的理解和自主遵守,也能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这样就可以实现城镇经济发展与良好生态服务的兼容,从而使城镇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总体而言,独立于城镇经济系统之外的自然生态系统,既是城镇经济活动的资源和生态服务的供给源泉,也规定了城镇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而主观能动性将通过技术进步而使得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

城镇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正负反馈,将在行为自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进行人

与自然之间的张力调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随着这种适应性应对结果的反思和累积,将升华为城镇文化的具象和抽象,城镇个性与灵魂由此突现。事实上,城镇经济活动始于自然资源的获取,因技术进步而逐步提高的获取能力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我净化能力产生消极影响,而随后的加工制造、分配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还将强化这种外源性压力。在行为自主体之于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的无意识状态下,每一次试错性的矛盾调适都将成为掌握并运用规律的基石,每一次的行为调整也将成为逐步接近行为规范的跬步,这种累积性迭代将逐步凝练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最终析出为城镇文化的基石。在此基础之上,城镇经济的分工与专业化演进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成为一种客观需求,而基于追求适应性目标的制度创新使协作具备了现实可能性。这种累积性制度创新将凝练为城镇居民之间和谐共存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侧面,成为城镇居民理解、遵守的最高原则,并内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潜意识。

总体而言,源于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和和谐共生的知识和法则及其表现形式,与源于分工协作需要而引致的城镇居民之间和谐共存的知识原则及其外在形态,共同构成了城镇文化的主要内容。而隐于城镇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念既是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基本准则,也是城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引和依归,还是这两个子系统良性耦合得以实现的保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价值引领需要通过城镇政治共同体来实现。

城镇政治共同体的职责与使命在于履行公共事务管理,是城镇存续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功能不只限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在于以城镇文化所内含的价值观念为指引,既要确保城镇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and 良好生态服务的供给,也要为城镇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还要合理调适两者之间的矛盾。城镇公共事业的日常管理在于提供公共领域的医疗卫生、交通、社会秩序、文化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其所需

资金还有赖于城镇经济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对城镇宏观经济的监测与调控、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调适成为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战略管理,所遵循的宗旨与原则唯一来源于城镇文化所隐含的核心价值观,而这种观念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仍将持续地受到城镇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调适实践经验的更新而演变,而城镇居民的社会化、个体化也是城镇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另外,政治共同体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其功能输出指向也包括城镇文化公共事业管理,这种涵盖城镇文化的具象和抽象两个层面的调控,将使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致背离其核心价值观念,使城镇共同体的本真和个性得以存续。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城镇自然生态系统决定城镇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及其路径,城镇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将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使两者之间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而政治共同体将通过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这也正是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推进城镇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协调人与自然的张力以实现和谐共生,构建城镇子系统良性耦合机制,共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 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建议

1. 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耦合策略

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耦合需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①扬弃城镇传统文化,创新城镇化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城镇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梳理城镇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提炼其合理内核,辅以新发展理念,使之成为指引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第

一动力。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用新时代城镇文化内含的价值观优化新型城镇治理体系,更新治理目标,创新治理工具与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③充分运用新时代现代化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绿色低碳和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为手段,调适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张力,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目标,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④辩证调适城镇经济、自然生态、城镇文化和城镇治理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城镇治理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应聚焦于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张力,还要关注城镇文化的演变对城镇经济发展、自然生态安全的消极影响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同时要不断梳理提炼子系统之间矛盾调适的实践经验,使之成为城镇文化更新的源泉和城镇治理理念创新的基础,继而调和城镇经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惟其如此,子系统之间动力机制的良性耦合才得以实现。

2. 智慧城镇建设策略

智慧城镇建设要在总结和提炼现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以下 4 方面的工作。①适时出台国家智慧城市规划纲要。探究智慧城市之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价值,及时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明晰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与形式,创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方略。②研究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 5G、AI 等数字技术标准为基础,按照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和韧性的要求,构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和发展的标准体系。③总结智慧城市建设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提炼城市智慧交通建设的共性,探索城镇经济产业、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路径,以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④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一个城市数字平台+一个智慧大脑+N 个智慧应用”为基础架构,完成公共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完善底层感知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加快 5G 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和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建设。

3. 启动元宇宙城镇建设

元宇宙城镇是数字城镇和智慧城镇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基于现实扩展技术(XR)、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孪生技术等融合而生成的虚拟化、数字化的城镇镜像。这种既与现实映射、交互,也具有独立性的平行空间,在不断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同时,还能提升智慧城镇建设质量,创新公共服务和城镇治理模式。启动元宇宙城镇建设需要开展4个方面的工作。①要为此既真实又虚拟的平行世界构建坚实的价值基础。将现实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制度设计和法律秩序等作为元宇宙城镇建设的基本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控制虚拟现实场景对真实世界的反噬。②要做好顶层规划设计,确立元宇宙城镇建设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原则,在论证科学、严谨的基础上构建可行的总体框架和实施方案,针对数字城镇和智慧城镇建设的实际情况,要在先试点示范后逐步推广。③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计算基础设施,同时开展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型基础设施和以服务创新为目的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④开展场景应用型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重点领域是扩展现实(XR)、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同步加强多技术叠加兼容、交互融合研究,实现数字技术综合应用的突破。

4. 传承与发展城镇优秀传统文化

为实现新型城镇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开展城镇文化传承与扬弃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①梳理城镇发展演变的历史,从源自于某一局境中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共存的长期实践经验中,提炼出优秀传统文化,探究其生长规律。②扬弃传统城镇文化,使之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③通过新媒体及各种传播渠道宣传新型城镇文化,以城镇治理为手段,将其渗透到城镇文化的具象和抽象的每一个方面,成为故乡与他乡

分野的标识。④发展城镇文化公共事业,创造条件培育和发展城镇文化产业,通过“文而化之”使之成为城镇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源泉。

参考文献:

- [1] 曹坤梓,丁成日. 新冠疫情是否改变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模式? [J]. 城市规划,2022,46(3):37-44.
- [2] 武廷海. 化危为机:应对新冠疫情与中国未来城镇化 [J]. 南京社会科学,2020(8):58-65.
- [3] 刘洁,姜丰,栗志慧.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1(S):171-178.
- [4] 肖祎平,杨艳琳.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时空特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9):112-122.
- [5] 赵玉,谢啟阳,丁宝根. 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J]. 区域经济评论,2020(5):85-93.
- [6] 徐维祥,徐志雄,郑金辉,等. 城市化质量的空间特征及其门槛效应研究[J]. 城市问题,2020(2):22-30.
- [7] 张慧,刘耀龙,冯洁瑶. 城市化质量、城市韧性对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基于山西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J]. 经济问题,2020(4):114-120.
- [8] 姚科艳,刘传俊. 城市化质量与文化产业发展互动效应测度研究[J]. 学术研究,2021(9):107-112.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创新项目组. 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J]. 经济研究参考,2013(31):3-32.
- [10] 苏红键. 城镇化质量评价与高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方略[J]. 改革,2021(1):134-145.
- [11] 王冬年,盛静,王欢. 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经济与管理,2016,30(5):69-73.
- [12] 戴为民,贺金梅. 人口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政策指向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20,27(5):32-36.
- [13] 李琪.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及策略[J]. 社会科学战线,2020(11):251-256.
- [14] 胡晶晶,倪泽楷. 贵州省人口、经济、空间、生活城市化耦合协调性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7(7):155-161.
- [15] 李琪. 城市化质量研究: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D]. 西安:西北大学,2012:18-20.
- [16] SARKAR S, ARCAUTE E, HATNA E, et al. Evidence for loc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conomies in urban scaling [J].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20, 7(3): 191-638.
- [17] SARKAR S, PHIBBS P, SIMPSON R, et al. The scaling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ustralia: possi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allometry, city siz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2018, 45(4): 603-622.
- [18] SHUTTERS S T, APPLGATE J M, WENTZ E, et al. Urbanization favors high wage earners [J]. npj Urban sustainability, 2022(2):1-5.
- [19] MANDUCA R A. The con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to regional economic divergence [J]. Social forces, 2019, 98(2): 622-648.
- [20] ROCA JORGE DE LA, PUGA D. Learning by working in big citi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7, 84(1): 106-142.
- [21] SHUTTERS S T, APPLGATE J M. The urban wage premium is disappearing in U. S. micropolitan areas [J]. Plos one, 2020, 17(4): 0267210.
- [22] SHUTTERS S T, LOBO J, MUNEEPEERAKUL R, et al. Urb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s as information networks: the effect on network density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occupations [J]. Plos one, 2018, 13(5): 0196915.
- [23] THAPA P, TORRRALBA M, BUERKERT A, et 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outcomes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farming systems: a global synthesis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21, 26(3): 24.
- [24] MUÑOZ P, ZWICK S, MIRZABAEV A.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Austria's carbon footpri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63(8):121326.
- [25] SALERNO F, VIVANO G, GIANNI T. Urban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surface water quality: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by reducing impervious surfaces [J]. Water research, 2018, 144(11): 491-502.
- [26] FARD B J, MAHMOOD R, HAYES M, et al. Mapping heat vulnerability index based on different urbanization levels in Nebraska, USA [J]. Geohealth, 2021, 5(10): e2021GH000478.
- [27] WHANHEE L, MUNJEONG C, BELL M L, et 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vulnerability to heat-related mortal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South Korea: a nationwide district-level time-series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22, 51(1): 111-121.
- [28] 张昱辰. 上海城市共同体的传媒建构:以火灾为例 [D]. 上海:复旦大学,2012:3-5.
- [29] 何一民. 中国城市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2.
- [30] 张丽花. 日本关于城市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与实践 [J]. 文化学刊,2015(8):123-126.
- [31] 辜胜阻,吴华君,吴沁沁,等. 创新驱动与核心技术突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J]. 中国软科学, 2018(10): 9-18.
- [3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J]. 管理世界,2014(4):5-41.
- [33] 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曲天夫,郭九林,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
- [34] 辜胜阻,李行,吴华君. 新时代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3(4):107-116.
- [35] 陈忠. 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46-63.
- [36] 罗知,万广华,张勋,等.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镇化: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J]. 经济研究, 2018(7):89-105.
- [37] 李红阳,邵敏. 城市规模、技能差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J]. 管理世界,2017(8):36-51.
- [38] 帕克,伯吉斯,麦肯齐.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 北京:商务出版社, 2012:44.
- [39] 岳家斌. “政治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亚里士多德公共邦学说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之比较 [D].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3:11-12.
- [40] 克拉克. 欧洲城镇史:400—2000 年[M]. 宋一然,郑昱,李陶,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6.
- [41] 郭琳.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意识[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43(2):25-33.
- [42] 陈飞雪.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理论研究[D]. 南宁:广西大学,2017:25-31.
- [43] 陈波,林馨雨. 中国城市文化场景的模式与特征分析——基于 31 个城市文化舒适物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0(11):71-86.
- [44] 傅才武,严星柔. 论建设 21 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55(5):63-74.
- [45] 孙久文,高宇杰.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创业活力[J]. 中国软科学,2022(6):85-95.
- [46] 王雨枫,曹洪军. 中国城市群城镇综合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J]. 中国软科学,2022(4):87-95.

(本文责编:辛 城)